



史海钩沉

一只瓷碗的故事

□孙凌霞

碗,想必大家并不陌生,它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,人们吃饭离不开它。在山东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,珍藏着一只粗瓷碗,它既不是名窑烧制的艺术品,也不是用料讲究的奢侈之物,看起来毫无新奇之处。它甚至还曾受过伤,现已残缺不全,可它却是一只充满故事、具有丰富内涵的碗,曾见证了鲁南铁道游击队的不平凡岁月。

这只粉彩莲叶荷花花卉碗是1942年由济南军区移交至山东博物馆展示的。碗为敞口、弧腹、圈足,碗壁残缺,有裂纹。碗身施白釉,釉面泛青。碗外壁绘深绿色的莲叶水草及红色荷花纹。1942年铁道游击队在滕县刘庄村一带活动时,大队长洪振海、副队长王志胜和刘金山等人在群众郝贞家中吃饭时,曾使用过该碗。

瓷碗的主人名叫郝贞,又名时大脚,曾是鲁南铁道队的女交通员。她1916年生于山东省峄县(今枣庄市境内)一户贫苦渔民家庭。其父郝尚田,一生捕鱼,育有五个女儿,郝贞排行老二。郝贞自幼勤劳能干,经常随父母和姐妹去微山湖里捕鱼捉虾拾湖产。郝贞在船上长大成人,长了一双大脚。

18岁那年,经人介绍,她同临城三街的时福友结为夫妻。人们按当地风俗称她“大老时”或“时大脚”。丈夫时福友为人忠厚老实,是一名在车站拾煤捡炭谋生的残疾人。郝贞与他结婚后生下一男一女,全家生活虽清贫,尚能勉强度日。每天,郝贞都用这只瓷碗为丈夫端上热汤热饭,俩人的日子清贫却幸福。

平静很快被战火打破。1938年3月17日,临城(今枣庄市薛城区)失陷,日本侵略者大肆劫掠,无辜百姓尸横遍地,时福友不幸被抓去兵营做饭。1940年,临城日军多次遭到鲁南铁道大队的袭扰,损失惨重。同年9月,敌人怀疑时福友私下为八路军通风报信,于是将其残忍杀害。

遭遇家庭突变,郝贞怀着对日寇的满腔怒火,携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,回到六炉店娘家生活。多少个日夜睹物思人,郝贞对着瓷碗暗暗发誓,有朝一日要和日本鬼子拼命,为丈夫报仇。

从1938年起,一支由铁路工人、小摊贩、矿工、流浪者们组成的游击队活跃在鲁南的铁路线上。他们紧紧依靠路矿工人和群众的掩护与帮助,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,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。他们扒铁轨、炸桥梁,撞火车、截物资,杀鬼子、惩汉奸,护群众、保家乡,像一把锋利的钢刀,插进敌人的动脉血管。

当时,铁道游击队干部战士既来自当地工农民众,又战斗和生活在民众之中,吃穿住用全靠群众供给。村民们无私接纳他们,不仅积极提供食宿,还多次冒险为他们传递情报,鱼水般的生死情谊,早已经将鲁南铁道大队和村民们融为一体。

这年10月,洪振海、杜季伟领导的鲁南铁道大队,由枣庄附近转移到津浦铁路西六炉店一带。洪振海等非常同情郝贞的遭遇,经常将从敌人火车上搞来的物资赈济她,并教育郝贞多为抗日做贡献。

当那只瓷碗再一次被摆上桌时,它已经成了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洪振海等人吃饭用的餐具。往日种种涌上

心头,郝贞坚决地对洪振海表明态度:“从今日起俺就是游击队的人,俺也要为咱中国效上一份力,为死去的人报仇!”从此,郝贞的家就成了铁道大队的秘密联络站,郝贞被吸收为交通员。

这只瓷碗见证了她由一个柔弱的渔家女,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。在艰苦的战争年代,她把两个孩子寄托给年迈的母亲,冒着生命危险,积极为铁道大队站岗、放哨、洗衣、做饭、侦察敌情、递送情报和掩护伤病员。

丈夫被日寇用刺刀捅死的惨景,穷凶极恶的日伪军火烧六炉店的残暴行为,激起她的满腔仇恨。她经常按照洪振海、刘金山、杜季伟等大队领导的指示,以到临城卖煎饼为掩护,把宣传品夹在煎饼里,巧妙地躲过日伪军岗哨和巡逻兵的搜查,在临城各处张贴。同时,她机警地观察敌伪军的动向,通过关系搜集敌人的情报,使铁道大队和其他抗日武装多次转危为安。

在那些充满惊恐的夜晚,游击队们为了逃脱敌人或者去执行任务回来,往往趁着夜色来到郝贞家中,为免惊动敌人,一般都不叫门,而是悄悄地跳墙而入。有的队员负伤了,她会把他们藏在自己家中,像对待亲人一样救护和治疗。

郝贞还经常跟敌人短兵相接,经历过很多危急时刻。一天,日军特务头子松尾带三名特务,化装成铁道队员闯入六炉店,企图偷袭铁道大队。此举被放哨的郝贞识破,郝贞一把抱住松尾的腿,大声喊叫发出信号。松尾一边对她拳打脚踢,一边拼命挣扎,用力甩掉郝贞拔腿就跑。郝贞见追不上他,就从怀里掏出一枚手榴弹,情急之下没拉弦就扔了出去。手榴弹正好砸在松尾的脚后跟上,他吓得连滚带爬地跑进一个院内,翻墙逃跑了。闻讯而来的洪振海同特务展开枪战,待特务子弹打光后,两名特务被生擒。

因为经常帮助铁道大队,郝贞也上了敌人的黑名单。因叛徒出卖,她曾两次被敌人抓捕,并遭严刑拷打。在一次次审讯中,鬼子对她用尽了各种残忍的刑罚。见皮鞭抽打不招,就往鼻孔里灌辣椒水,甚至还用上了老虎凳。非人的折磨、钻心的疼痛让人难以抵抗,可每当想起受害的亲人,郝贞的意志更加坚定,她始终回答“我什么都不知道”。

恼羞成怒的敌人把烧得通红的烙铁狠狠地按向她的后背、腰和腋下,一处地方烧焦了,就再找另一处继续烙。最后,郝贞全身上下血肉模糊,骨头也被打断,但她始终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丁点儿铁道大队的机密。后来,铁道大队和地下党组织积极营救,郝贞终于逃出了敌人的魔掌。

解放战争时期,郝贞在中共临城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,又积极参加支前工作,带领家乡一带的广大妇女为前线部队磨面、碾米、做军鞋、救护伤员,工作非常出色,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。

在波澜壮阔的战争岁月里,人民战争显示出了无穷的威力。铁道游击队的生存,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。为帮助铁道游击队,老百姓受了很多苦,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,像郝贞这样深明大义、勇敢朴实的女性还有很多。她们都是普通的农村妇女,但在抗日战争中,她们嫉恶如仇、爱憎分明,对日寇怀着刻骨的仇恨,又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掩护铁道游击队战士,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递情报、救护伤员。正是因为她们的侠肝义胆、铁骨柔情,铁道游击队才能够在鲁南抗日战场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,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“飞虎队”。

战争虽然残酷,但也留下许多温情。一碗水、一碗饭,是深厚的军民情谊;一份情报、一身伤痕,是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
如今这只碗静静陈列在山东博物馆,早已失去了与郝贞初见时的完整鲜艳,可它承载着小人物的记忆,见证着那段抗战岁月中由无数群众凝聚成的不可磨灭的力量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刘公岛巡查官邸和巡捕住所:威海卫警察的诞生地

□彭均胜

在刘公岛康来饭店的北邻,有一栋石结构的二层建筑。主楼东侧为连体附属房,一层有封闭外廊,西门与南窗外飘。建筑为块石垒砌,“石岛红”条石包护墙角。这栋两面坡屋顶、烟囱高耸的建筑就是英租时期的巡查官邸。该官邸1902年始建,1913年重建,在其西侧,有体量较小的平房,由巡捕居住。后由于警力增加,巡捕住所已不能满足需要,遂将此房改为花房,巡捕宿舍移至提督署西侧之民房。目前,这两栋英租警用建筑保存完好,它们不仅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见证,也是威海卫警察的诞生地。

英国强租威海卫后,伴随着英国军队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到位,西方的行政制度、司法制度、警察制度也相继移植到威海卫,设立了威海卫临时行政署,管理租借地行政事务。威海卫的地方治安则采取以华制华策略,由英国招募的殖民雇佣军——中国军团,也就是“华勇营”维持。“华勇营”由英国军官统帅,一色的英式装备,一样的英式训练,具备相当的战斗力。在1900年,“华勇营”曾跟随英军攻打北京和天津。这也是威海卫现代意义上的警察,并最早出现在刘公岛上。

威海卫警察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,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。1900年,英国人在刘公岛上组建了14人的警队。1902年4月,几个承担巡查任务的中国军团官兵调入殖民政府,成为租借地首批警察。但警察的数量很少,1903年只有15人,1904年发展到19人。由于经费的制约,警力仍然不足,整个租借地的治安巡逻任务仍由中国军团承担。1906年中国军团解散后,殖民政府从解散的官兵中挑选人员充实到警察队伍,剩下的则漂洋过海,前往香港等地谋生,这也是最早的香港威海卫警察。这次共组建了23名新警察队伍,同年9月组建完毕。并呈不断逐年扩张的趋势,1907年增加到60名,1915年达到95名,1923年为122名,至1930年增至201名。

随着新警察队伍的建立和不断扩充,威海卫租借地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西方管理模式的警察制度。英租时期警察作为英殖民当局实施殖民统治的基本骨干力量,其组织机构非常严密,专门设立了管理警察的机构——副华务司署,下设警署(总巡捕房,设在码头区后营)、警局、警卡(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)。警署设警督一职,由英国人担任,主管整个租借地警务工作。警署还下设码头、刘公岛、乡区三个警局,各由一名英国巡查管理。刘公岛警局主要负责岛上的监狱、治安、消防、卫生和税收等。码头警局主要负责殖民政府的安全保卫、码头区的治安、监狱管理、稽查偷漏税等。乡区警局主要负责农

村15个警卡的管理。大部分警力分配在乡区警局,另有一部分侦探则由正、副华务司直接控制使用,还有一部分水上巡捕归码头警局管理。

正如英国军队是雇佣制,等级森严一样,租借地警员内部也是等级分明。1903年殖民政府专门颁布了《警察法令》,主要分高级警官、巡官、巡佐和警士。高级警官即警督。巡官又称“萨振特”,因所佩臂章为三道黄杠,俗称“三道杠”。巡佐即巡长,又称“考布”,所佩臂章为二道红杠,俗称“二道杠”。警士又称警察、巡捕。警官、巡官一般由英国人担当,巡佐和警士全由中国人充任,而且尤以本地人为主。在殖民统治的32年间,英籍巡查的数量除1917年为4人外,其余年度均为3人,剩余人员全部是中国人。英租时期还设立了“视查”即警察特务机构,另外,消防队员由巡捕兼任,没有设立专职人员。

警察的职责非常广泛,可以说无所不包、无事不管,工作内容也非常繁杂。巡捕有维持治安、刑事侦察、刑事指控、卫生市政管理、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救助等一系列功能,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比如:若见疯狗,必须打死;井边洗衣,必当禁止;大路上有阻碍交通的石头,应当挪开;街上乱走无人照管的牲口,应当扣留;乱贴广告的、随地大小便和打架吵闹的,应当捉拿……岛上巡捕主要负责监狱、税收、森林、卫生、注册、消防、灯塔和市政管理。

管理制度也比较严格,可谓警纪严明。警察离开营区必须留话并报告所去之处;无岗无差的晚上10点后必须回巡捕房;每天站岗8小时,分黑白班,各4小时;站岗时不可与无关公事的人交谈,更不可擅离岗位;不可因本身受人欺凌或因本人之宿怨而与人同讼;不得为犯人传递食品、口信,更不得收受他人贿赂……

英租时期的威海卫,辖区常住人口一直稳定在15万左右,警力配备为千分之二,在当时的情况下,较为合理。威海卫总体讲社会稳定、治安良好,使英国殖民者与外来的商人、游客有了安全的感觉,也提升了威海卫的对外影响。

上世纪20年代,山东内乱,匪患四起,但威海卫却如“世外桃源”,常有外来避难的富商要员,甚至包括韩国的皇亲国戚。正如1930年国民政府接收威海卫的调查专员朱世全在其《英国租借威海卫之经过》报告中所讲的:“历年内乱,地方不静,内地人民皆愿托庇外人,冀免苛税,甚至有私代英人将界石向外移动,实为造成此现象之最大原因。”在肯定英国警察制度带来租借地社会治安良好的同时,不可否认威海卫作为英国殖民地,他们之所以移植警察制度,一切都是维护其殖民利益为目的的。

刘公岛
巡查官邸现貌